

## 孙运锦与《白奁山人年谱》及《寅宾录》

原 思 训

孙运锦(1790-1867),字绣田,一字心仿,号铁围山樵,晚年号垞南老人,江苏铜山人,是徐州文化名人。清同治十三年(1874)《徐州府志》孙运锦传称:

孙运锦,字绣田,铜山人。道光乙酉拔贡,咸丰元年举孝廉方正。性颖悟,读书过目不忘。宿迁王氏多藏书,运锦馆于其家,手抄心识,昼夜不倦,故所学益博,诗赋冠绝一时。尝游淮扬间,有江南才子之目。遭乱,避兵夏镇(今微山境内),侘傺无聊,而好学不倦。尝独步榛莽,访求古碑碣,见者称为奇人。明万寿祺诗文久散佚,运锦哀纂为《隰西草堂集》,其文由是得传。徐郡志纂自乾隆之初,迄今百余年,运锦欲重修之。广搜古载籍,自史鉴至唐宋人小说无不备采,著《徐故》七册,凡十馀年,书未及成而卒。<sup>①</sup>

文中提到的万寿祺(1603-1652),字年少,又字内景,江苏徐州铜山人。崇祯三年中举,积极参与复社活动。清兵渡江后,在苏州附近举兵抗清,兵败被虏,后获救,衣僧服隐居江淮。多才多艺,诗书画俱佳。目前尚存他撰著的《隰西草堂集》最早较完整版本就是孙运锦所辑的道光四年(1824)本。包括《诗集》五卷,《文集》三卷,《遁渚唱和集》一卷。该书后来亦见于民国八年(1919)罗振玉辑的《明季三孝廉集》,罗氏还曾辑《隰西草堂集拾遗》,并撰写《万年少(寿祺)先生年谱》。

孙运锦是道光十年(1830)《铜山县志》的主要编纂者。根据同治十三年《徐州府志》和民国十五年(1926)《铜山县志》,孙氏尚有许多著述散佚,诸如《搬姜集》二十八卷,《徐故》七卷等<sup>②</sup>。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收藏有他的《与我周旋斋百一诗录》三卷清抄本,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收藏有他的《垞南诗草》稿本等二十三卷。2010年,笔者得见孙运锦后人珍藏的鲁一同致孙运锦信札一通(图见封二),该信言及另外两部著作:《白奁山人年谱》及《寅宾录》,信札

<sup>①</sup>朱圻等修,刘庠等纂:《同治》《徐州府志》卷二十二,同治十三年刻本。

<sup>②</sup>朱圻等修,刘庠等纂:《同治》《徐州府志》卷十九。余家谟等修,王家诰等纂:《铜山县志》卷二十,民国十五年刻本。

全文如下：

心仿尊兄大人阁下：

再奉手裁，并晤左清石先生三月事，具知近状。毕刺史莅邳，弟力言兄之品学，渠颇殷向往，欲延以笔墨之事，未知宾主东南，曾有延津之合否？

《白牵山人集》得吾兄《年谱》节钞及《寅宾录》。弟以三月之功细加编校，复为《年谱》一册，颇搜昔遁。日夕冀望刻贲之来，乃润臣以家事烦溷，遂以力有不逮为辞。据吴稼轩员外云，渠终当遂事，惟不能尅期应命耳。当此时势，岂可迟而又久？弟意别约同人贖金为之，而岁事不登，颇难启口，至今耿耿，未尝去怀抱也！

至其中时日先后，尚有可疑。此类甚多，姑举一二：如汧置草堂落成，张谱与本集竟相径庭。而详味诗意，似本集系之癸未，亦非实录。钱塘之游或以为戊申，戊申八月尚在大名，明年元旦又在邯郸，此中几何时而游钱塘？拜孝陵亦少迫促矣！或以为在三关之后，又或以为拜孝陵与游钱塘并非一年，刻在袁浦，未尝以本集得随，姑记之如此，以质先生。此皆节目之不可解者。先生登岱凡四，竟不可件系何年。

叶润山侍郎曾仕闽中，卒以忧死，见《全谢山集》中。而本集题注称为部郎，国变死节，凡此之类，未敢悬定。安得亲就先生而面质之，庶可无草草成书之诮。

先生如已就毕刺史之招，妙不可言。否则能仗策来游，就清翁于浦上，谋十日之谈。或能即事生情，另图坐席，亦一妙也。

兹以胡香亭孝廉来使之便，率草数行。临楮百拜，幸弗浮沉，相思此心，无任惓惓，敬请道安，惟照百一。

小弟鲁一同顿首，八月廿二日袁浦书。

鲁一同（1805—1863）字兰岑，一字通甫（父）。清代道光、咸丰年间著名古文家、诗人、画家，安东（今江苏涟水）人，后迁清河（今淮安市）。道光十五年中学，后屡试不第。他不仅工诗善画，而且注重经世之学，不但他的学识为当时士人所盛赞，其睿智的政治见解，更为林则徐、曾国藩等名人赏识。“林文忠公则徐总督湖广，请与偕”，他“欲行而以亲老止”；“曾文正公国藩尤敬异，庚戌试礼部，居淮安馆舍，数屏驺从，就问天下事”<sup>①</sup>。著有《通甫类稿》、《通甫类稿续编》《通甫诗存》《通甫诗存之余》《右军年谱》，纂《邳州志》《清河县志》等。

在《通甫类稿》中，收录有鲁一同为孙运锦父亲孙文蔚写的墓志铭——《文学孙君墓志铭》，谈到他和孙运锦的相识时间与过程：

道光二十九年春，薄游彭城，观其三川郁勃，慨然想见古来文武豪俊之士。退游里巷，问求明故老闻、万之遗踪，而后生少知其事者，盖耆旧凋丧尽矣。暇日披览图籍，得邑明经孙君运锦所为《铜山志》，问之教授潘

<sup>①</sup>文彬、孙云等纂修：《重修山阳县志》卷十四，同治十二年刻本。

君，曰：“然，吾知之。”明日偕以来，笃雅君子也，出其所纂闾、万二公遗书，网罗周详，盖好古而能言者。<sup>①</sup>

这里的“明故老闾、万”指闾尔梅和万寿祺。可知，道光二十九年（1849）鲁一同在徐州主讲云龙书院，曾追访闾尔梅、万寿祺遗踪。在看到孙运锦纂辑的《铜山县志》后，经人引见相识，并见到了孙运锦网罗周详的闾尔梅、万寿祺遗著。可见两人的志趣相投，从此往来过从甚密，在孙运锦的《与我周旋斋百一诗录》中就有多首与鲁一同相关的诗<sup>②</sup>。

信中的《年谱》即《白奎山人年谱》，见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王锡祺辑《小方壶斋丛书》<sup>③</sup>，是一部记述闾尔梅生平的传记编年。闾尔梅（1603—1679），字用卿，号古古，因耳大白于面，又号白奎山人，江苏徐州沛县人。明崇祯三年举人，曾参加复社活动。清军人关后散尽家财，私结死士，以图反清复明。做过史可法幕僚，曾两次为清军所俘，逃脱后流落各地多年，后回乡。其诗文有清初豹韦堂刻本《白奎山人诗集文集》和1922年张相文编《闾古古全集》。清光绪十九年（1893）徐州太守桂中行和探花冯煦编选万寿祺、闾尔梅著作，将两位矢志反清复明的同乡作品合刊为《徐州二遗民集》，由是“徐州二遗民”成为一个专有符号，凸显两位同年生、同年举人所代表的文化精神内涵。

又，《寅宾录》是综合闾尔梅友人题赠的书信，诗文，序跋和附诗、附传为一体的文集。它们最早收录于清光绪二十一年王锡祺辑《小方壶斋丛书》，后有民国四年（1915）刘承幹嘉业堂版《白奎山人年谱》附《寅宾录》。这两部书又于1963年和1982年分别为上海古籍书店和文物出版社重印。

但是，无论上述哪一部书和版本，都将《白奎山人年谱》的作者署名为“山阳鲁一同编”，《寅宾录》则署为“山阳鲁一同辑”，与信函揭示的成书过程有一定出入。如鲁氏信中说“《白奎山人集》得吾兄《年谱》节钞及《寅宾录》，弟以三月之功细加编校，复为年谱一册”，显然，鲁一同是在孙运锦的（白奎山人）《年谱》节抄和《寅宾录》基础上细加编校，才完成了增订的《白奎山人年谱》。根据鲁一同的信，《寅宾录》的纂辑者和上述各本题署有很大出入，需要进一步探询。

为此，笔者走访了上海图书馆，查阅到两书稿本，进一步证明《白奎山人年谱》和《寅宾录》两书都与孙运锦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上海图书馆不仅收藏有不同版本的《白奎山人年谱》和《寅宾录》，还收

①鲁一同著：《通甫类稿》卷四，《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十七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

②包括《赠鲁通甫一同山阳举人，主云龙书院讲》、《次韵通甫扇头墨梅》、《题隰西草堂集寄通甫己酉》、《次韵通甫读白奎山人诗之作》、《送通甫归袁浦》、《通甫许志先子墓，因秋试改期，回徐需时，来索家传，因述怀》、《得通甫书，先志过岁赉到，并有所推荐，因答》七首。

③王锡祺辑：《小方壶斋丛书》第二集，光绪二十一年铅印本。

藏有这两部书的稿本。《白奁山人年谱》有两个稿本：

稿本一，书封面题“张氏原本，通甫增辑”，用白绵纸抄写，版心处空白，不仅修改涂抹之处少，而且年份的书写方式，内容与出版的《小方壶斋丛书》及嘉业堂版本完全相同，显然为定稿本（上海图书馆书目著录：“白奁山人年谱，（清）鲁一同编，稿本，索书号：线善 794602”）。

稿本二，没有书稿封面，也未署纂辑者名字。用纸的版心镌“清河县志稿”字样，修改涂抹处很多，山人事迹年份的书写方法是帝王年号记年在后，干支年在后，与印本不同（上海图书馆书目著录：“白奁山人年谱，（清）鲁一同辑，稿本，索书号：线普长 748401”）。

比较两稿本字迹，均出自一人之手。稿本二在“十一年壬子”条目的眉端上有注释，其结尾标注“丁巳十月廿日通父又书”。而“十一年壬子”条已近《白奁山人年谱》一书的结尾，说明鲁一同完成该书的时间可能在是年或稍晚。

《寅宾录》稿本，共三册，第一册卷端上题署“寅宾录”，下双行题“铜山孙运锦辑，山阳鲁一同校”，版心处上题“寅宾录上 书问”。第二册版心处上题“寅宾录下 诗歌”。第三册版心上题“白奁山人集卷末”（上海图书馆书目著录：“寅宾录，（清）孙运锦辑，抄本，索书号：线善 789261-63”）。

笔者将上海图书馆著录为抄本的《寅宾录》笔迹和孙运锦赠友人诗《题仇实父山水卷》及其稿本诗词《垞南诗草》等笔迹对比后发现，《寅宾录》抄本的大部分内容显系孙运锦手书。其中孙运锦手抄的潘耒《送白奁山人游三关》部分眉端是鲁一同的一条长注的绝大部分，末尾鲁一同还以讨论的口吻写道：“心仿先生以为何如？”并落款“丁巳二月廿二日灯下识”。丁巳年为咸丰七年（1857），《送白奁山人游三关》文在《寅宾录》抄本第二册的后部，因而推测鲁一同完成《寅宾录》一书校注可能在该年。由上述两条注释结尾的落款时间推测，两书的脱稿时间均在1857年前后。并且由校注时间先后推测，鲁氏是先校注了《寅宾录》，后完成了《白奁山人年谱》的增辑和校注。笔者将上海图书馆著录为孙运锦辑抄本的《寅宾录》与《小方壶斋丛书》版对照，内容完全一致，说明孙氏辑本实际上是稿本。鲁一同只是在孙氏辑本上校注，没有再做清誉，而《白奁山人年谱》一书则数易书稿。须注意的是两书稿本上书写的编辑者和校注者都不像孙运锦与鲁一同字迹，或为他人所为。

至于鲁一同信中和孙运锦探讨的问题，如泃置草堂落成，游三关、拜孝陵等等不仅在上述潘耒《送白奁山人游三关》一文内有所反映，而且在《白奁山人年谱》和《寅宾录》两书的多处相关地方都以“孙氏以为”和“孙氏心仿云”等语作交待。

综上，根据鲁一同信札叙说的“年谱节钞”与“寅宾录”得自孙运锦，两书定稿本上的署名，《寅宾录》抄写字迹，以及鲁一同信札中提出探讨的问题与

两书内相关部分的高度一致。可以认为两书定稿本上的署名:《寅宾录》署“铜山孙运锦辑,山阳鲁一同校”,《白奞山人年谱》署“张氏原本,通甫增辑”是符合实际的。虽然从鲁氏信中可以看出他急切希望将书付梓的心情,可能终因时局不定,时值捻军和太平军举事,英法联军入侵和筹措刻资未竟等原因而无法如愿。到1895年《小方壶斋丛书》刊印两书时鲁一同已经辞世三十年。之所以出现目前我们看到的两书出版物署名状况,是后来的出版者所为。需要说明的是从上海图书馆的《寅宾录》稿本看,孙运锦在将它给鲁一同以前,已经在多处加了注,这些注释也保存在上述该书各印本内(凡有“孙心仿云”、“孙氏心仿云”、“孙氏以为”等字样处均属此)。虽然我们无法见到孙运锦提供的白奞山人年谱节抄原貌,但从《白奞山人年谱》书中一些类似语气推测,孙运锦在年谱节抄的一些地方也有加注。

另须特别说明,张相文在其编的《阎古古全集》中刊载有他编的同名《白奞山人年谱》,并在年谱前附言:

按,山人年谱,前清道咸间山阳鲁通甫一同先生曾就张氏原本重为增辑。近年,吴兴刘氏刻之《嘉业堂丛书》中,然非完善本也。兹据山人原集,并考群书为更订之,至鲁氏所辑《寅宾录》,亦摘其精要按年分系,庶便参稽焉。<sup>①</sup>

这段文字清晰地表明了张相文本年谱与鲁氏本年谱及《寅宾录》的关系,本文不再赘述。据前讨论及该附言,无疑显示张相文本年谱与孙运锦也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以上仅就鲁一同信札涉及的孙运锦与《白奞山人年谱》及《寅宾录》的关系作初步讨论,至于孙运锦是如何与从何处获得的年谱节抄,以及他纂集《寅宾录》所涉及的诸多问题有待深入探寻。

感谢孙运锦后人提供鲁一同致孙运锦信札复印件。在笔者调研过程中,得到上海图书馆陈先行先生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张玉范先生的热情支持帮助。张玉范先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罗琨先生都细心审阅拙稿,并提出中肯建议,特致诚挚谢忱。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sup>①</sup>张相文编:《阎古古全集》第一册,民国十一年(1922)财政部印刷所。

